

2015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浙东乡土小说的 **民间建构**

傅祖栋 ◎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浙东乡土小说的 民间建构

傅祖栋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建构 / 傅祖栋著.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78-1151-0

I. ①浙… II. ①傅…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482 号

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建构

傅祖栋 著

责任编辑 吴岳婷 刘 韵

责任校对 何小玲

封面设计 元石设计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151-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8

序 一

吴秀明

文化和文学之间是双向互动的。文化的各种因子是文学的养料，会驱动和影响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而文学则集中和凝聚了文化的精华，是文化的富有意味的呈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土壤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地域文学，而什么样的地域文学则反映了什么样的地域文化。

浙江是一个地理空间小而人文空间大的文化大省。较之别的省份，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进入晚近以后，传统文学文化不但率先实现了现代的转型，而且达到了更加辉煌的境地。20 世纪初期，“浙江潮”曾抢占先机，迅速占领中国新文学的制高点，引领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严家炎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中有道：“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①柯灵先生在《浙江省文学志》序言中也指出：“新文学运动的发祥地在北京，和浙江却有很大的关系”，像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等大批文化先驱，都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一些重要的新文学流派和社团中，都有浙籍作家积极参与”^②。这是浙江的一个骄傲，它在给浙江现当代文学筑就很高平台的同时，自然也给现代以降的浙江作家和学者以很大的压力。这一点，作为生长在浙江并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学人，我是深有体

①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载《理论与创作》1995 年第 1 期，第 10 页。

② 柯灵：《〈浙江省文学志〉序言》，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6 页。

会的。

浙江现代乡土文学也不例外。作为浙江新文学中重要,也是最深沉固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发展,其原因自然相当复杂,但无疑与所在的地域文化——浙江文化的滋养密切相关。地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使各地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从浙江走出去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所内含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文学史的,更是地域文化的。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深深体现了与之具有血脉关联的浙江文化的特质,是浙江文化给予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馈赠;另一方面,又融会吸纳了其所寓居的城市文化的思想艺术资源,以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审视着昔日的故土乡俗,从而形成了既地域又超地域、既同构又异质的双重观照视角。这也就是说,现代的乡土文学绝不是“纯乡土”的,它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城市文化的“第三只眼睛”,它是作家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后对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种回望和审视,其所秉持的往往是启蒙的文化立场。在今天看来,这种启蒙到底如何评价,这种评价又是否涉及对乡土的重评?这应该是一个饶有意思的话题。

自觉张扬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当然难能可贵。但如果过于自恋,缺乏自省、超越与开拓,这样的地域文学能否成为与时代对话的艺术,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就很难说了。文学的地域与地域的文学,主要不在回溯,而在前瞻;不在怀旧,而在创新;不在回到“地域的世界”,而在走向“世界的地域”。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和文化境界,看待地域文化资源,保存地域文化个性,增强地域文化在当代存留发展的潜能,并进而认识到它在面对标准化、一体化日甚的现代化大潮流下,在文化精神生态上的重要平衡作用。如此,地域文学才能获得更为丰富的生命内容,释放出它应有的魅力和风采。这也告诉我们,对文学的地域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地理空间,还应融入时间因素,将历史、现实与未来三者打通,从人文时空的大背景、大视野中去观照把握,这毫无疑问是一次文化的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又引发了文学自觉,推进了文化和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在这里,“双重的自觉”,就足以让人们感受到对地域文化和文学关注的重要意义及久远价值。

文学地域性主要不取决于题材本身,而是突出体现在对题材的艺术转换和审美创造上。虽说地方风俗是地域性的重要表现对象,但如果仅仅停留于生活表象的罗列,文学只能是一种浮浅化的民情风俗的拼贴。浙江大地有着稳定、鲜明、独特的地域特征,对作家而言,这自然是一份宝贵的艺术资源和文化馈赠。“浙江文化”及“浙西文化”“浙东文化”“浙西乡土作家群”“浙东乡土作家群”等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也传达出了一个强烈的地域文化信息,这是对这个地域文化特征的一种概括,一种带有群体性、集合性地域文化风貌的描述。它表明我们的文学研究已不满足于用一般的“理论模型”(如某某主义、现代性、世界性、人性等),而是开始注意到脚下这块文化热土的根性即地域性的特征,表明我们对浙江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了更深入的沉潜和体味。

需要指出,从具体的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学术界已多有涉足,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包括浙江省内的同行,也包括浙江省外的专家和学者,它构成了浙江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不过在我看来,这之中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往往较多停留在狭隘的纯文本层面,就作品论作品,且论域限于风俗描写、方言应用等外饰部分,缺少一种形而上的追索精神,因而研究显得紧仄拘泥;一是与之相反,偏离文学文本,将研究重心完全移向对外在地域文化的社会调查或实证分析上,用文化取代文学,这样,文学作为文化中最富个性、情感性、审美性的特点就被遮蔽了。这两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前者比较突出,暴露的问题也较多;而90年代以后,后者开始逐渐上升,并且很有些固化、模式化了,地域文学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难以摆脱的窘境。特别是随着当代乡土文学的逐渐萎顿乃至衰退(这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突出症候,也是缠绕所有当代作家和学者的一个严肃而又沉重的话题),而新的乡土文学或曰后乡土文学的隐晦不明,迟迟未能建构,它由此及彼,在客观上不能不对现代地域文学研究产生影响。

上述种种,构成了傅祖栋本书写作的背景。不管他有无意识到,他是在乡土文学研究处于徘徊不前的窘迫状态下进行的。可贵的是,他抱持清醒的意识,从民间文化角度契入,对此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表现了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的坚执和勇气。祖栋的研究,就范式而

言,大体偏向于文化研究尤其是民间文化研究。他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具体探讨了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背景、民俗事象、民间语言、形象谱系、创作范式以及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的民间文化意识,对民间文化与浙东乡土小说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做了颇富见地的概括和梳理,为浙东乡土小说的整体性观照提供了理论的可能。祖栋推崇实事求是的研究与研究的实事求是,强调持论有据、论从史出。但他也不想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完全纳入纯文化研究范式中,而是注意吸纳并融入艺术审美的思维、理念与方法,将文化与文学打通。为此,他在对浙东乡土小说进行研究时,又不时地超越文化,沉潜到小说的文本世界,不忘对其内蕴的文化个性、审美内质进行阐发,尽管在这方面,较之文化研究略显薄弱。某种意义上,祖栋这部论著可以说是以文化为本、兼及审美的一种研究。它反映了作者对包括民间文化在内的浙东地域文化的爱与知,从中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学、文化学等传统研究方法的钟爱。

六年前,祖栋曾跟我攻读在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他为人朴素实在。这本书是他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地域文化这个话题看似容易,实则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它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但正如祖栋自己在“后记”中所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浙东人”,他的这种地域的情结,使他当年做学位论文时,几乎毫不犹豫地將眼光瞄准了浙东乡土小说。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为此“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是在有丰富史料积累和充分学术准备的基础上从事本书写作的,而且直至今天依然兴趣不减。这也应该是他身上执着的“浙东性”使然。当然,我也盼望祖栋能进一步扩充知识结构,强化前沿意识和审美感知,从而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有一番气象来。

2015年6月18日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序 二

牛殿庆

青年学人傅祖栋新近由宁波市社会科学院资助出版一部学术著作，邀我为序，尽管心怀忐忑，还是欣然接受，原因有二，一是我真是有很多话想说说这个人；二是这本书积累了傅祖栋十余年的心血，尽管我已老朽，嗓音已无底气，但还是想扯破嗓子为这个有为的年轻人鼓噪几声。

一、“小傅”与我结缘

那是2005年夏天，学校招聘辅导员，我是人文学院院长，主管进人的事情。傅祖栋是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当然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吸引学校各用人单位部门领导眼球的是他的科研成绩，在大学期间公开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和出版一本专著，大家都认可他是个人才。他修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我专业同源，因此他的简历最后到了我手上。

我和傅祖栋第一次见面，是在宁波大学对面的我校的老校址，在我的教室改成的办公室里。他进来后我和他握握手，让座、倒水。再就是我问一句他说一句，他多一句也不说；我不问，他就闷坐在木椅上，直到今天我和小傅的交流也是这样。他的性格就是有点“木讷”，但我母亲说过：“贵人话语迟。”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这是“贵人脾气”“君子气派”，我要定了。

傅祖栋成了人文学院的辅导员。“小傅”和“牛院长”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友谊。小傅做事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人品端正厚道，组织活动像模像样；做学问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方法得当。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

记评价他,说:“你看他多说一句话都吝啬,可到他给学生演讲比赛做评委时,却说得头头是道。”不出一年,小傅得到了人文学院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同。

下半年,学校整体搬迁到大学园区南区。记得学校开秋季运动会时,党校办说要小傅到他们那里做秘书。我舍不得小傅,他在我身边,我们可以一起做做课题,搞搞学问,这是私心;再说了,有小傅这个人在身边我踏实。想到年轻人要成长,人往高处走,耽误人家我会愧疚一生。于是,我同意了。

这些年,我早已不是“牛院长”,还依然叫他“小傅”,他执拗地还是叫我“牛院长”。其实我是极其不喜欢这个称谓的,更愿意学生们叫我“牛教授”。

去年年底学校启动了一个人才培养计划——领雁工程,小傅填报我为他的导师,于是我们成了名正言顺的师生关系,为此我感动了好长时间。我这个人尽管学品学养都不够高,但好为人师,有这么个得意的弟子,足慰余生耳。

二、这个人:读书人的脾气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或许小傅早就深谙其理。他上教学一线,是想把心放到安静处,与文字厮守一生。2007年到2010年,小傅成了著名学者、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秀明的硕士生,功德圆满,顺利毕业。能进吴门,小傅靠的是丰厚的科研业绩。

这些年应该说小傅和我搞学术研究是十分默契的,我们报科研项目一般是我出个题目,提供个思路,然后几个人坐下来谈,谈一谈一个好项目就砸实了,然后就选个人把项目申报书做出来。以前是我亲自操刀,这几年小傅做得多,也有团队其他人做,小傅填的申报书现在我改动得越来越少了,这些年我申请下来几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小傅参与了很多工作,做得认认真真、丝丝入扣。

要说与人交,小傅显得笨拙或木讷,但他讲诚信,说到做到;重义气,宁可吃亏、受苦受累,也要一诺千金做到底;可他却十分爱面子,不愿求人,求人矮三分,这就是中国古代“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能摧眉折

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文人骨气。他就是找我办事也轻易不开口，都是他到我办公室来我逼着他问，再就是我求着他给他办事。小傅做真人实事，不说假话，不逢迎拍马，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士人风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为知己者死”。

他就是一块璞玉般的性格，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大学这块净土想找这么个书呆子谈何容易？

可做起学问来他是睿智和与时俱进的。我们团队要申报一个关于浙东民风民俗的科研项目，大家都各抒己见出了很多点子，我感到都无新意可言，坐在沙发上给大家沏功夫茶，小傅提出“渔文化”的概念，而且要从史学的意义去规范，就一下子点亮了我的眼睛。

对浙东文化的研究，小傅在大学时就已开始，这与我的研究方向相左。他注重史料积累，厚积薄发。他治学如为人，掺不得半分假，每当问他“这个选题往下还要做一些，不够深度。你看还能做到什么程度？”时，他会说：“这我要去图书馆找几本书看一看。”他这个人做学问也踏实，让人相信。

我发现小傅治学的敏锐和聪明，体现在他选的一个研究方向上。前几年申报宁波市哲社规划课题，他选了宁波市名人故居保护政府干预。申报了，立项了。再报省社科联项目又从浙江区域入手做作家故居研究，接着我们承担的宁波市旅游特色资源库项目，他这个“名人故居”又搬进了资源库，这又开发了旅游资源，是实践应用。这些年，他一直在开公选课《浙江文化修养》。小傅，是一个教学、科研、社会应用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三、关于这本书

可以说这本书是小傅多年的积累，我对人说：“这是小傅一个字一个字积累的宝贝。”

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这么一些概念：浙东民间文化、浙东文化、浙东乡土小说等，根植在这些概念阐释的基础上，再发掘浙东文化的来龙去脉。小傅在众多大家的理论文献中，沉淀出了自己的思想，那就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对民间文化的建构，当然这也离不开他生于斯长于斯情于

斯的对这“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眷恋、体悟、关注和研究,所以他才提炼出浙东刚硬劲直的“山岳气”和宁静平和的“水性格”,这是刚柔并济的性格,丰富了浙东民间文化刚绝勇武主导下性格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真是如层层剥笋,这本书接下来的研究进入对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的民间文化素养的深究细研。小傅的研究是从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的出身追究的,他发现:“浙东乡土小说作家自小家道贫寒,饱受人间疾苦,与下层人民有着共同的感受,对旧社会都有着强烈的逆反和抗拒心理。”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巴人、潘漠华、魏金枝都有着这样相似的经历,在“经历”中理出浙东乡土小说作家人格上的“浙东性”,这是小傅这本书很重要的学术发现。还有在通过民俗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个案剖析上,得出民俗文化的正面影响是作家对故乡、对人生的赞美,由此萌生出家国情怀的性格因素,而落后愚昧和陈腐观念这些负面影响,激发了他们反封建的斗志。

在这一层一层的理性剖析后,这本书终于进入浙东乡土小说的文本研究层面了。小傅的文学批评的观点是建构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且绝不偏离民间建构的主场,就是他在小说文本中找民俗事象、民间语言,通过小说的人物形象,追寻浙东文化的民间味儿。在分析论证浙东乡土小说的形象谱系时,小傅将此分成两大类,即“渗透着浙东文化因子、内蕴着石骨铁硬性格的乡民”和“身负‘老中国儿女’奴性的精神胜利的‘阿Q’”两类群像。

至此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生于乡土写作乡土,傅祖栋是生于乡土研究乡土文化研究乡土小说,又学习评论乡土小说,要说这其中的相通之处,就是:同根同情。乡土作家有爱有哀的复杂情感,通过小说的媒介传达给了小傅,小傅这个钱塘江畔的农家子弟,在这本书里倾注了浓浓的深情,只要你静心品读就会受到感染。他总括出了:“在浙东乡土小说中,整体性地雕塑出了一批在与自然环境和环境的搏斗中表现得‘石骨铁硬’的乡民群像”,“他们身上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具有一种强悍刚毅的性格”。

再次感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计划——领雁工程,把我和小傅名正言顺地拉在了一起,我十分愿意做小傅的师傅,项目里叫

导师,这我不敢当,我觉得还是师傅更亲切。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读书作文的心得和自己大半生的人生经验传给年轻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礼记·学记》有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我是“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有小傅这个后生激励我,我会“教学相长”,我会: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以小傅为荣。

2015年6月14日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浙东民间文化的渊源流变 / 40

第一节 “山文化”和“水文化”的互动相制 / 41

第二节 “远传统”和“近传统”的合流共生 / 49

第二章 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的民间文化意识 / 56

第一节 人格上的浙东民性 / 56

第二节 创作中的民间理性 / 66

第三章 浙东乡土小说的创作范式 / 77

第一节 “乡土批判”型叙事 / 78

第二节 “乡土眷顾”型叙事 / 103

第四章 浙东乡土小说中的形象谱系 / 116

第一节 石骨铁硬的乡民 / 116

第二节 奴性十足的“阿 Q” / 127

第五章 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事象 / 136

第一节 重礼而繁复的婚姻民俗 / 137

第二节 “灵魂不死”“命运轮回”的民间信仰 / 156

第六章 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间语言 / 174

第一节 方言土语：民间文化的外化形态 / 174

第二节 人名符码：民俗学建构称谓规范 / 188

参考文献 / 193

后 记 / 199

导 论

地域文化积淀联系着一个地区的民风、民情,地域文化精神所产生的潜在力量相当程度上会影响作家创作精神、创作风格的形成和转化。浙东民间文化悠久厚重的积淀,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的血液之中、意识深处。正是这种文化基因,使他们身上必然带有无法磨灭的“浙东”印痕。从他们内心世界的替代结构——创作文本来看,他们对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觉接受,是显而易见的。让文学承载文化,让创作烙上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已经成为浙东乡土小说作家日益自觉的艺术追求。

乡土小说不仅是一个文学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学命题。出于期求在这一命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考虑,本书选择民间文化视角来审视浙东乡土小说,并采取重点突破或“点”的深入,主要对王鲁彦、许杰、许钦文、巴人、柔石、魏金枝、潘漠华、王西彦等知名度较高的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力避空洞而抽象的理论陈述或理论推断。试图通过对浙东民间文化背景和源流的梳理确立浙东乡土小说的特定文化渊源,通过对作品中民俗事象、民间语言、形象谱系、创作范式等的研究,透视作家浓郁的故乡情怀和对改造“乡土浙东”的深沉思考,从而确立浙东乡土小说的经典意义。

通过地域文化视角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一种研究途径,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这种从文化的范畴中寻找文学之所以如此的依据,同时从文学的形态中探求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的研究模式,既能够避免单纯文化研究的空泛和过于理论化,又可以为文学研究开拓一个新的维度。而这种对浙东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正落实了地域文化和文学关

系研究的既定目标。因此,本书只从五彩斑斓、内蕴深厚的浙东民间文化中选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因素:一是生态环境,指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生存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主要是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二是文化传统,指浙东乡土小说作家所倾心接受的浙东历代先哲所共有的精神气质和思想智慧,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浙东式”的价值取向,即所谓的“浙东精神”。

一、“浙东”“民间文化”与众家言说

(一)“浙东”及“民间文化”

既然本书探讨的是民间文化视域下的浙东乡土小说,我们有必要先对“浙东”和“民间文化”这两个概念做一界定。

《浙江通志》: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①

《辞源》“浙东”条释义:

谓浙江省东部地区,唐置浙江东道。南宋时为浙江东路,辖绍兴府及婺、衢、处、温、台、明六州。明清时为宁、绍、台、金、衢、严、温、处诸府地。^②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波涛汹涌的钱塘江把整个浙江省分成了

^① 《浙江通志》(卷一)。

^②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793页。

两片,即钱塘江以东的“浙东”,钱塘江以西的“浙西”。这里所指称的“浙东”“浙西”约雏形于唐代。唐代置十道,浙江隶属江南道。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今浙江省境全属江南东道。唐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分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各设节度使。其中,浙江东道领越、明、台、婺、衢、睦、温、处八州,治越州。北宋初期,浙江隶属两浙道,后改为两浙路(治杭州),“两浙”简称源于此。真正定名却在南宋。宋室南渡,偏寓临安,于南宋宁宗嘉宝元年(1208),始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分别简称为“浙东”“浙西”,此后则一直沿用至民国时代。

因此,本书所指称的“浙东乡土小说作家”,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生活于现代,主要创作时期也在现代;二是籍贯为浙东;三是文学旨趣相投。这三个标准是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而“浙东乡土小说”自然指这些作家在现代期所创作的、着眼于“浙东”地域的乡土小说。

浙东、浙西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地理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两地人民不同的精神面貌。概括而言,浙东地区群山环抱,多山地、丘陵,“土性”特征明显,因而为生艰难,并导致浙东人勇猛进取,吃苦耐劳,敢于外出闯天地;浙西地区河道通衢,多平原、盆地,“水性”特征明显,因而民生富足,并导致浙西人平和中庸,安土恋家,很少外出讨生活。因此,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曾说:“浙西的事,跟我们浙东人毫不相干。……浙西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浙东呢,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①

地理区域不同,人文精神自然迥异。明代王士性在比较两地文武风气的异同时提出: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帑^②悦^③,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慨,鲜富贾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威

①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浙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② 帑:小囊,俗称荷包。

③ 悦:古时的佩巾,如现在的手绢。